

史學與文化思想：司馬光對諸葛亮故事的重建

Hoyt Cleveland Tillman*

(田 浩)

本文以個案研究來探討傳統中國歷史著述中文獻運用的自由度與限制間的張力，並彰顯其中的複雜性。因為《資治通鑑》的敘事結構著重於事件的展開，所以司馬光（與劉攽、劉恕、范祖禹）在重新連綴早期史家支離脫節的敘事時便有相當的自由度。這種自由在他重構陳壽的《三國志》和裴松之的注時，尤其顯著。司馬光重建諸葛亮故事時，他刻意選擇以前文獻中的某些詞彙，而同時在變動的地方自由添加自己的文字。一些學者或許會覺得司馬光改變之處僅僅出於文字風格和方便敘事的考慮，但本文作者卻企圖尋繹司馬光的論述模式，並以此例說明傳統歷史學家既欲忠實傳統，又試圖把自己的價值鐫刻在歷史與文獻傳統之中。

關鍵詞：司馬光 《資治通鑑》 史學史 諸葛亮 《三國志》

* 美國亞歷桑那州立大學歷史系

一、前言

關於中國史家如何修史，西方學者通常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派觀點認為，就像 Eric Hobsbawm 所討論的歐洲人一樣，中國史家也從事「發明傳統」的工作。¹ 晚近，Paul Cohen、詹啓華 (Lionel Jensen) 及 Takashi Fujitani 的著作，強調並指出了二十世紀東亞學者對歷史的「發明」和扭曲。Paul Cohen 的華北義和團研究，反思事件 (event)、歷史 (history)、神話 (myth) 三者之間的張力與互動，他把這三者看作三把「鑰匙」，以增進對一個獨特事件的跨文化理解。² 詹啓華的《製造儒學》(*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 顯示了胡適如何發展他所想像出來的古代儒者與孔子的歷史。³ Fujitani 則敘述近代日本以十九世紀後期的歐洲為榜樣，透過大型的禮儀來強化日本的帝制，他從創造「輝煌的君主制」(*splendid monarchy*) 的角度研究這一過程，大量依據當代歐美的理論家來討論記憶與身份認同之建構。⁴ 除了少數例外，⁵ 有關東亞「發明創造論者」(*inventionist*) 史學的研究，大多聚焦於十九世紀後期與二十世紀的歷史重建。但是，另一種觀點仍然左右著大多數現今傳統中國史學研究者所作的思考方式。傳統中國史家運用的是有些學者所稱的「剪貼式」的修史方法，將早期文獻中的敘述拼湊在一起，同時做到句句皆有所典。⁶ 根據這種看法，中國史家本質上不過是文抄公，

¹ 關於歐洲背景下的「傳統的發明」和「大眾創造傳統」的問題，見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rpt. Canto ed., 1995).

² Paul Cohen,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³ Lionel M. Jensen, *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⁴ Takashi Fujitani, *Splendid Monarchy: Power and Pageantry in Modern Japa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⁵ 一個較早的例外可能是我對陳亮 (1143-1194) 的討論，陳亮把孔子描繪成「一洗」歷史記載使之變為理想的「正大本子」，見《功利主義儒家：陳亮對朱熹的挑戰》(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頁96-97, 104-105, 112, 136。詹啓華 (Lionel Jensen) 最近的文章提供了一個更為明顯的例外，見他的“Wise Man of the Wilds: Fatherlessness, Fertility, and the Mythic Exemplar, Kongzi,” *Early China* 20(1995): 407-438.

⁶ 如，W. G. Beasley, E. G. Pulleyblank, eds.,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7. 但在他自己的文章中 (“Chinese Historical Criticism: Liu Chih-chi and Ssu-ma Kuang,” p. 135), Pulleyblank 教授提醒大家注意，這一特點並不適合那些最偉大的中國傳統史家。

並起著保存古代典籍中文字的作用。因為後來的作者避免在既存的敘述之上加添新詞及自己的解釋，所以中國的史學傳統具有很強的保守性。這一「語言的保守主義」(linguistic conservatism) 暗示，其歷史事件和解釋與「創造的」歷史論述範式下之理解有極大差異。以這兩幅截然不同的圖像為背景，我將以一個案研究，來探討傳統中國歷史著述中文獻的自由度與限制之間的張力，並顯示其中的複雜性。或許，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從這一討論中，獲得有助於歷史思考的東西。

二、為甚麼用司馬光所敘述的諸葛亮作為個案研究？

人們容易嘲弄以上兩種關於中國歷史思維的觀點，認為一方是在歪曲歷史，另一方則保守僵化，缺乏對歷史的解釋。因此，以一位學者們公認的偉大史學家作為個案來省察——特別因為他求實及審慎地運用史料——就很重要了。司馬光(1018-1086)顯然是合適的人選，因為他的《資治通鑑》是中國史學史上的里程碑和傑出成就；而且，他深明自己對史實的評論，並穿插於宏大敘事之中。W. G. Beasley 和 E. G. Pulleyblank 兩位教授稱讚司馬光的歷史「可能是所有歷史著述中最偉大的」，他們認為：

我們很幸運擁有相當多關於其編撰的信息，使我們能夠欣賞到高水平的論述，這些論述可用來分析其對材料的選擇與比較。它可能代表著剪貼式的框架所能達到的極限，這種極限恐怕連司馬光也很難達到。⁷

但還是有一些對司馬光的批評。如，儘管陳明錄 (Ming K. Chan) 教授聲稱司馬光「有選擇地陳述史實」，並且「不是完全客觀的」，他還是承認：「但，總體上司馬光的確相當地尊重歷史事實，整本《通鑑》提供了準確的史實。」⁸幾百年前，朱熹已經非常尖銳地批評了司馬光的歷史論斷：特別是當司馬光為其宏大敘事篩選資料時，他省略了某些歷史人物不合道德的事實和情節。⁹不過，按照

⁷ Beasley and Pulleyblank, p. 7.

⁸ 陳明錄 (Ming K. Cha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Tzu-chih t'ung-chien*: A Survey," *Monumenta Serica* 31(1974-75): 2-38, 特別是第38頁。關於最新的司馬光研究書目，見龔小斌 (Xiao-bin Ji), "Conservatism and Court Politics in Northern Sung China: The Thought and Career of Ssu-ma Kuang (1019-1086),"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8).

⁹ 朱熹, 《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本, 1986), 卷一三四, 頁204-207; 參見錢穆,

謝康倫 (Conrad Schirokauer) 的說法，朱熹「不能也沒有指責司馬光犯了大的過錯，在缺乏可信史料的情況下填充歷史記錄的空白，而這是孔子所譴責的。」¹⁰ 雖然我在別處討論過朱熹個人的哲學思想如何影響他對史家的批評，¹¹ 我仍然同意朱熹批評司馬光的一個看法：篩選資料和書寫歷史，要比簡單地為既往之事保存記錄複雜得多。但是，我的目的是想通過詳細比較司馬光的敘事及其資料來源，來思考司馬光的史學，從而釐清他在運用那些資料時所表現的受限或自由的程度，並表明其史學的複雜性。我不追隨一般的看法，把司馬光當作一位特別具有權威的歷史編纂家，而代之以審視他的文本，將它與資料來源相比較，並分析他在早期資料取捨上的模式。儘管本文是第一篇運用這種方法來討論司馬光有關諸葛亮敘事的文章，但我並非聲稱我的方法是獨特唯一的，而只是闡明我的研究取向。

除了受皇帝之命編輯並由皇帝頒行外，司馬光完成於一〇八四年的大作之所以獲得其權威地位，主要因於他的崇高人格，清晰的表述，及其著作的不朽價值。暫且撇下其它不談，這裡我想先評述有關這著作不朽價值的兩個因素。首先，司馬光著述的上下時限長達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公元前403—公元959年）。就規模而言，與它最為接近的先例是司馬遷在大約公元前九十年寫成的《史記》。這兩位史家所處理的是多個王朝的興盛與衰敗，而其它主要的官修史書皆只以一朝歷史為內容。那些官修史書追隨司馬遷的原型，為統治者作本紀，為其他個人寫傳。結果是，朝代歷史中的歷史敘事變得支離破碎；而且，主要人物的重大細節常散見於數個傳記之中。司馬光著述之所以重要的第二個原因是，他把歷史變成單一連續的敘述，而這種敘事方式對於官方史書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整合；而且，在這種形式下，個人的故事更容易被敘述得栩栩如生。

《朱子新學案》（臺北：三民書局，1971），卷五，特別見頁136-138。確實如此，主要就是為了恢復這些故事、批評歷史人物，朱熹才指導他的學生重寫司馬光的史書，通過歷史悠久的「褒貶」筆法提出道德主義的歷史教訓。

¹⁰ 謝康倫 (Conrad Schirokauer), "Chu Hsi's Sense of History," in Robert Hymes and Conrad Schirokauer, eds., *Ordering the World: 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 202-203. 謝康倫在這裡提及一段被認為是孔子所說的話：「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已夫」。（《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¹¹ 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臺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96），頁261-262。

司馬光的歷史敘事具有強化故事人物魅力的特質，這一點在諸葛亮（181-234）的故事中尤其明顯。諸葛亮是三國時期劉備（162-223）的蜀漢（221-263）政權中主要的謀士和主政者。就是因為諸葛亮是一位在動蕩不安年代中的重要角色，所以司馬光敘事的潛能在諸葛亮故事的敘述中特別突顯。這一時期的歷史資料相對而言也很豐富，因為兩位優秀的史家保存了攸關史料，並作了校比。陳壽（233-297）接觸到三國時各國的檔案和圖書館，在朝廷支持下編纂了《三國志》。¹² 裴松之（372-451）另外收集了二百多種史料，並融進他的《三國志注》中。《三國志注》完成後進呈御覽，受到劉宋（420-479）皇帝的認可，因而得以與《三國志》並行於世。雖然裴松之增補的有些史料明顯為陳壽所拒斥，甚至裴本人也對它們有所批評，但這些資料為後來作者提供了珍貴的寶藏。如 Moss Roberts 所觀察到的，《三國志》（及裴注）可以被看成中國最優秀的歷史小說《三國演義》的史料之祖——就像司馬光的敘事可以被當作這部小說的格式之祖。¹³

因為司馬光的敘事結構著重於事件的展開，所以他在重述早期史家支離破碎的故事時便有相當的自由度。這種自由在他重構陳壽《三國志》時尤其顯著。而且，司馬光和他的從員所見之《三國志》及裴注為一〇〇三年的刻本，如此多的史料以刻本形式出現，使人們更易接觸也便於運用、揀擇保存在裴注《三國志》中的大量史料。除了撰史的品質和裴注中新增的史料，陳壽的史書分為三個部分，對應三個國家，給了司馬光極佳的重構機會。鑑於陳壽受到晉朝皇帝的委派，而晉朝皇帝聲稱自己是魏國（220-265）的合法繼承人，所以陳壽必然把魏作為正統，並從魏國的角度來寫史。（這樣的限制的確引出了陳壽記載的問題；但我在別處已說明陳壽敘述的基本理由。）¹⁴

司馬光著名的正統論給了我們一個例子，說明他在處理歷史問題與爭論上的客觀性之所以被高度評價的原因。由於在中國長久以來人們認為中國只能有一位正當的統治者，許多傳統歷史學家認為，無論什麼時候只要同時有超過一個的朝

¹²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本，1959）。

¹³ 見 Moss Roberts 英譯本《三國演義》*Three Kingdoms, A Historical Nove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 949.

¹⁴ 關於我為陳壽所作的辯護，見〈諸葛亮論：分析陳壽的《三國志》和裴松之的注〉，這是遞交給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在臺北舉辦的「魏晉南北朝學術」的國際討論會的論文；參見其論文集。

廷統治中國時，最爲關鍵的問題就是誰繼承了正統。¹⁵ 但是，在難以確定孰爲正統合法的朝代繼承時，司馬光認爲：

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感，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返諸正也。…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¹⁶

然而，基於編年史與記述年代的需要，司馬光選擇魏國作爲其它兩個國家歷史發展的參照點「以紀諸國之事」。而司馬光終究因無法確證劉備爲漢室後裔，不認可劉備聲稱自己「紹漢氏之遺統」。¹⁷

司馬光確有自己的道德判斷。雖然他（在上面引文中）聲稱要客觀地處理事實，以便讀者作出自己的評判，但他在處理諸葛亮時所用的敘事語言相當複雜。例如，一方面，與陳壽相比，他的某些措詞更爲偏袒諸葛亮。陳壽按地理位置將立基於四川的國家稱爲「蜀」，而司馬光卻稱其爲「漢」；因此，雖然他不認可劉備以漢朝繼承者自居，司馬光還是遵循劉備對自己國家的稱法。另一方面，在其它地方司馬光所用的貶低蜀漢地位的語言，與陳壽相比則有過之而無不及。陳壽只是寫到二三年諸葛亮「出」斜谷討伐魏國，而司馬光改變了整個圖像，用了「入寇」一詞。¹⁸ 這個改變一定是有意的，因爲在其它兩處，司馬光在描寫諸葛亮征伐時作了相同的語言變化。¹⁹ 當然司馬光有時也寫諸葛亮「出」某地方或「攻」魏；而且陳壽在〈魏明帝紀〉以魏國爲中心的記事中，也兩次用「寇」形容諸葛亮的軍事行動。但是，我覺得這些例子不能否定司馬光三次把「出」改成「入寇」這件事的意義。某些學者或許認爲這樣的語言只是「以魏爲記」的表現，但我想其語調卻暗含超越「以記諸國之事」的道德論斷。「入寇」當然也可以讀作「攻打」；但由於「寇」也指強盜和劫掠，所以司馬光的語言不僅反映了

¹⁵ 如，陳學霖 (Hok-lam Chan), *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 Discussions under the Jurchen Chin Dynasty (1115-1234)*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4).

¹⁶ 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本，1956），卷六九，頁2187-2188。

¹⁷ 《資治通鑑》卷六九，頁2188。

¹⁸ 《三國志》卷三五，頁925；《資治通鑑》卷七二，頁2267。

¹⁹ 《資治通鑑》卷七一，頁2239及卷七二，頁2291。見《三國志》卷三三，頁897及卷三五，頁925。

魏國的視角，而且也表現出反對諸葛亮征伐的批判語氣。例如，朱熹就抱怨司馬光用「入寇」一詞，貶低了蜀漢的道德與政治地位。他說：「臣舊讀《資治通鑑》，竊見其間…漢丞相亮出師討賊而反書入寇，此類非一，殊不可曉。」²⁰ 嚴衍（1547年卒）編纂《資治通鑑補》時，以「伐魏」取代「入寇」，意思是諸葛亮以正義之姿對魏國進行懲罰性的征討。因此，雖然他基本上沿用司馬光的詞彙，但在這一特別的問題上持反對意見。²¹ 不過，即使「入寇」一詞會如此遭人異議，司馬光還是用了這種批判式的辭彙，而不顧他自己曾說過要避免使用《春秋》的褒貶筆法。由此，描寫諸葛亮軍事征伐的批判式語言，便與他使用「漢」指稱劉備政權之意相左，因為「漢」的另層涵義便是承認劉備自稱與漢朝皇室的关系，從而產生的歷史和道德合法性。所以，當論及諸葛亮之國時，司馬光的歷史敘事並非有先後一貫的觀點。

儘管在司馬光的敘事中有如此明顯的不一致之處，但我期望能讀出他書中內在的一貫性——尤其是那些司馬光在照錄前朝官方史籍文本時省略的詞，和那些顯然為建構其敘事而加入的詞。首先，我承認許多這樣的改變或者可能過於細微，以致於司馬光在《考異》中未加討論，或者看上去只是為敘事增色所作的文字風格改變。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某些不贊同此種分析的學者可能會認為，司馬光所作的語辭改變或只是文風的變化而已。而且，那些中國學者很自然地以為我疏忽或根本無視這種可能性，亦即：他的改變僅僅出於文字風格和敘事便利的考慮。然而我會尋繹出司馬光論述的重要模式，使其細微的文字改變與之彌合無間，從而構成更大的歷史圖像。的確，我要展示的是司馬光刻劃諸葛亮的歷史脈絡，以及使我們能夠理解有關諸葛氏的文句和辭彙，這些論述與我們起初對司馬光肯定諸葛亮的一般印象有所出入。

三、諸葛亮與三位三國人物之死的關聯

以司馬光如何利用史料，來探究諸葛亮與其當代的三位人物死亡之關聯，讀者可能會感到驚訝，甚至震撼。這三個人，是指卒於二二〇年的劉封，卒於二二

²⁰ 朱熹，《朱子文集》（臺北：允晨文化出版社，2000），第三冊，卷二二，頁812-813。

²¹ 嚴衍，《資治通鑑補》（1876年刻本）卷七一，頁1下、卷七二，頁21下。我感謝冀小斌建議我查閱該書，並感謝 Peter Bol 教授協助我看到這本哈佛燕京圖書館的藏書。

五年的雍闓及二二七年的馬謖。在第一個例子中，諸葛亮殺劉封的建議引出一個隱憂，涉及諸葛的倫理道德。劉封是劉備早年未有子嗣時所收的養子，但後來劉備立親生子劉禪為太子。劉封羞辱同僚蜀將孟達（227年卒），以致於孟達投奔曹操（155-220）；後來，孟達、曹操聯合起來擊敗了劉封。故事發展到這裡，陳壽插入一句關鍵的話：「封既至，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²² 而司馬光刪去了這句話，繼續敘述道：「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漢中王因此際除之；遂賜封死」。²³ 請注意引文中「因此際」三字的力量與作用，這三個字強調了諸葛亮建言殺封的根據。刪掉陳壽說明劉備如何責罵劉封一意孤行、戰敗沙場的句子，司馬光的敘述改變了諸葛亮建言的基礎點，認為這只是因為諸葛亮個人對劉封的不信任。司馬光還刪去《三國志》劉封傳前文敘述關羽圍樊城及襄陽時，劉封與孟達不承命的一段敘事；因此，有可能只是因為他認為這些對劉封的批評都是不可靠的，所以司馬光才刪去所有的句子。無論司馬光刪句的理由為何，我要強調的是它的影響：當他刪去陳壽所寫劉備對劉封失敗之反應的關鍵句時，除了諸葛亮掛慮劉備死後劉封「終難制御」所以不信任他這一點理由之外，整體敘事便未指明劉封被殺是基於何種原因。如此一來，司馬光可能使讀者對諸葛亮的行為和動機有相當負面的印象，因為有人會認為諸葛亮是爲了劉備的皇位繼承人（劉禪）而考慮，或者爲了確保自己的影響力。

第二個例子引出司馬光作為歷史家的基本問題。陳壽的《三國志》清楚寫道，叛將雍闓爲另一位叛將高定（225年卒）所殺。²⁴《華陽國志》中也有同樣的說法。²⁵ 在嚴衍的《資治通鑒補》和盧弼的《三國志集解》中，沒有其它史料與此記載相左。²⁶ 而且，在已知的其它資料中也未見有不同的說法。但是，司馬光卻讚揚諸葛亮將兩位叛將處死。²⁷ 當然，人們可能解釋其間的差異只不過是爲了敘事流暢。雍闓、高定都不是主要的叛將，司馬光如此簡單的交待乃是爲了諸葛亮七擒七縱孟獲提供背景的說明。然而，在我看來，保留高定殺雍闓故事情節

²² 《三國志》卷四〇，頁994。

²³ 《資治通鑒》卷六九，頁2180。

²⁴ 《三國志》卷四三，頁1048。

²⁵ 常璩，《華陽國志》（四部叢刊本），冊一，卷四，頁4下。

²⁶ 見《資治通鑒補》卷七一，頁2下；《三國志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2；1957年古籍出版社本重印本），卷四三，頁849。

²⁷ 見《資治通鑒》卷七〇，頁2224。

更有助於理解爲甚麼諸葛亮處死高定，而卻一再赦免其他叛將。因此，這一簡化的敘事足以影響到故事所欲表達的更大義涵。無論如何，就我們從現存資料中所能讀出的，司馬光似乎跳出史料之外，或更改史料，創造出一段細節，從而增益諸葛亮平亂之功。

在一場史學史會議上，我曾指出司馬光的敘事與資料不一致，當時著名的宋代史學史專家張元教授反對我的看法。首先，張教授敏銳地注意到我的說法（即司馬光明顯地偽造了這一細節）與一般所接受的對司馬光作爲史家的評價相反。其次，由於在《通鑑》編纂中，有其他著名史家幫助司馬光，最終的成書是多人合作的結果，所以當我們要把某一具體細節的編纂歸於司馬光時就必須特別小心。在審稿意見中，張教授詳細闡明了他的反對意見（參閱跋）。《資治通鑑》編纂的成就主要基於其他一些史家的工作，他們分別對各段歷史有極深入的理解。只有這樣的專家才有關於史書的詳盡知識，並掌握史料，這些都是選錄和編組時必需的條件。像《資治通鑑》這樣的書不是一個人的能力所能勝任的。司馬光有幸得到三位特別優秀的歷史學家的幫助：劉攽（1023-1089）、劉恕（1032-1078）與范祖禹（1041-1098）。如果他們不是爲他選錄和編組材料，那麼他們的作用是甚麼呢？而且，張元教授「感覺司馬溫公的思辨分析能力並不很強，『臣光曰』的論議應該能夠反映溫公對史事的解析，也顯示出溫公思考方式簡要、明快的特色，抽象的思考與推理都不是他所擅長。」張教授還在他的一篇論文中闡述了這一論點。²⁸ 如此，劉攽、劉恕、范祖禹可能在《資治通鑑》的史學中，扮演了比司馬光還要重要的角色。不管在何種情況下，他們共同詮釋史料，並且必定在主要問題上看法一致。我想說的是，《資治通鑑》由一批史家共同完成，而且劉恕負責編纂三國時期的初稿，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司馬光指導並督促整個計劃，既然他提出編纂的標準，還決定在敘事中依據何種史料，他就對全書負有最終責任。因此，儘管有一些史學家協助司馬光，但這顯然與我們今天組織一群史學家來寫歷史的情況不同，司馬光在其中有著更大的權威、負有更大的責任。而且，即使重要的問題都經由四位歷史學家討論並達成共識，司馬光作爲整個編纂計劃的督導者，仍是負最終責任的人。所以，以司馬光之名作出史評，實爲一便捷的作法。對我來說，最關鍵的是那些變化與用詞對整個大敘事的影響及

²⁸ 張元，〈試論《資治通鑑》的開篇〉，見《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頁587-600。

其含義。如果我們的研究發現司馬光在詮釋史料時的模式 (pattern)，我們就必須假定司馬光意識到且肯定這些改變。因而，我們對司馬光筆下有關諸葛亮的總體描述所作的考查，可能會對雍闓一例及其它《通鑑》和以前史料之間的落差，提出嘗試性的解決之道。

最後，張元教授進一步強調，司馬光從來沒有在《通鑑》敘事上加進自己的話，他對陳壽敘述的改變一定有文本依據。換句話說，張教授眼中的司馬光是遵循中國史學傳統規範——即上文所討論的語言保守主義——的典型史家。儘管我尊重張元教授對司馬光史學的研究，²⁹ 但我認為他的斷論——司馬光在改變陳壽所陳述的事實與用詞時一定有文本根據——是有問題的。為支持他的觀點，張元教授引用北京大學兩位歷史學家周一良教授 (1913-2001) 和田餘慶教授的研究成果。這兩位教授的研究提供兩個特別的例子，他們相信司馬光，或更可能是他的助手們，從一些史書中摘取資料，這些資料在北宋的司馬光時代仍然可見，而後來卻遺佚了。³⁰ 這兩個例子確實對我的論證是一個挑戰。但是，周一良教授的論點是關於晉惠帝永興元年 (304) 的一件事，而田餘慶教授討論的是漢武帝征和二年 (公元前93年) 的史事。而這兩個例子皆出於三國時代前後，這一點很有意義。因此這兩個例子或不能輕易地適用於三國時期的歷史。我們可以想像司馬光曾經參考的資料現在已經佚失，因為《太平御覽》的確提到某些現已遺佚的三國時代史料。但是，我仍有理由相信今天現存的歷史文獻，就是司馬光和他的同僚用來編纂《資治通鑑》三國部分的資料來源。五世紀時，裴松之已經收集到極其完備的資料，這些都是一百多年前陳壽未能採入書中的文獻。而且，因為裴松之的補充資料和他的注與《三國志》並行，在一〇〇三年有了第一個刻本，所以幾乎可以確定地說，司馬光等人在編纂《資治通鑑》時使用的就是這個便利的版本。考慮到這個版本的名聲和流行性，難道司馬光不會就其改變這些材料說明緣由，並指出文獻來源嗎？如果他確實使用了其他超出裴注或官方文獻之外的史

²⁹ 張元教授的博士論文主要討論司馬光和朱熹的史學，見《宋代理學家的歷史觀：以《資治通鑑綱目》為例》（國立臺灣大學博士論文，1975）。也參見張教授的《司馬光對東漢曹魏歷史的理解》，載於《宋史研究集》（臺北：國立編譯館，1996），冊二四，頁77-106。

³⁰ 周一良，〈北朝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載於其《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155；田餘慶，〈論輪台詔〉，見其《秦漢魏晉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52, 53。

料，我想他會在《通鑑考異》中作些解釋或者提及這些史料。由於裴松之的補充材料特別的豐富、完備、便利，三國文獻目錄的比較研究，應該能夠為我們深入評價司馬氏的史學方法及其背景提供相當獨特的基礎。至少，在我們採信張教授對雍闓之死的不同詮釋前，我們應當探討《資治通鑑》中對陳壽記載的變更可能蘊含的意義。我們還應當發現這些變更是否為了某種明顯的目的，是否與某種模式相合，或是否符合諸葛亮在司馬光史學中的整體形象。而且，我們應當考慮在其它有關諸葛亮的敘事中，司馬光明顯穿插自己意見的地方。

第三個例子是二二七年諸葛亮涉及的馬謖之死。雖然劉備對馬謖不悅，諸葛氏卻非常尊重馬謖，並讓他率領第一次伐魏時的先遣兵力。諸葛亮直接下達堅守防禦街亭的指令，但馬謖違背了這些命令，因馬謖之失，魏國很容易就擊垮蜀軍的先鋒。在馬謖傳中，陳壽只是說，為懲罰因他違反軍令而導致的伐魏失敗，「謖下獄物故」；³¹ 也就是說，馬謖死於獄中。在諸葛亮的傳中，陳壽寫得更加明確：就在諸葛亮上疏陳述戰敗及馬謖違令之前，他「戮謖以謝眾」。³² 陳壽在〈王平傳〉中也寫「丞相亮既誅馬謖」。³³ 裴松之注中的兩條史料，因馬謖之死而責備諸葛亮；這兩條都出自東晉習鑿齒（384年卒）的《襄陽記》。一條是蔣琬對諸葛亮所講的一段話，「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哉」。「可是，這段話不在《三國志·蔣琬傳》裡；我們不知道這段話是後來東晉習鑿齒從何依據來的。」另外一條，習鑿齒自己批評諸葛亮的時候，他就把蔣琬所講「戮智計之士」寫成「殺其俊傑」。³⁴ 所以，在晉習鑿齒之用法中，「戮」和「殺」的意思顯然並無不同。雖然「戮」表示「殺」（特別是在戰爭的情形下），它也指「剝奪某人的權力或榮譽 (to disgrace)」，含有法律制裁方面的意思，就如同「處決」或「行刑」兩個詞。同樣地，陳壽所用的詞是「戮」和「誅」，很顯然有「誅戮」的意思。可是，司馬光卻插進去諸葛亮「殺之」的字句。³⁵ 習鑿齒的兩條評論性資料說服了司馬光，而且司馬光把習鑿齒對諸葛氏的批評從裴注升到史書的正文。於是司馬光便把諸葛亮描述為殺馬謖以正軍紀、嚴法威。而且，《資治通鑑》用「殺之」而不用陳壽所用的「戮」或

³¹ 《三國志》卷三九，頁984。

³² 《三國志》卷三五，頁922。

³³ 《三國志》卷四三，頁1050。

³⁴ 《三國志》卷三九，頁984，《襄陽記》和習鑿齒的評論。

³⁵ 《資治通鑑》卷七一，頁2241。

「誅」，這很重要。這對某些學者而言或許非常普通，只是一個將幾種史料綜合並簡化的例子。但是，這再一次的顯示，陳壽《三國志》與司馬光《資治通鑒》的差異，可以被解讀作後者強化了諸葛亮在馬謖之死事件中的角色；至少它給我一個強烈的印象，是諸葛亮下令殺了馬謖。

雖然如此，司馬光不僅引陳壽之說敘述諸葛亮哭馬謖之死，還加入裴松之的另一條材料，說明諸葛亮關愛馬謖的後代，這使諸葛亮更有人情味。因此這第三個例子提供了一條可能線索，讓我們了解到司馬光如何以這三個例子來褒揚諸葛亮，而非否定諸葛亮。上述諸葛亮斬馬謖的敘事中，加入正面形象的述事也出現在其它的例子中，這是否成了一種模式？

四、司馬光敘述中的幾種可能模式

對於諸葛亮拒絕赦免犯法者，司馬光採用了類似的正面立場來解讀。在引用裴松之的一條史料時，司馬光寫到諸葛亮拒絕赦免的原則：「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³⁶ 據說，諸葛亮引述的是劉備的警語；劉備認為劉璋（219年卒）與其父廣下赦令，削弱了蜀國的治國之道。司馬光並又加進自己的話：「由是蜀人稱亮之賢」。接著，他援引陳壽的評論指出：「諸葛亮為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³⁷

陳壽《三國志》的法正（176-220）傳和裴松之的補充材料，提出了一些特別複雜且非常敏感的問題，就是有關諸葛亮實施刑罰的問題。陳壽的〈法正傳〉敘述了諸葛亮拒代他人請劉備限制法正恣意的行為。事件發生在劉備任命法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之後。按照陳壽的說法，法正：

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

「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³⁸

對於這籲求，諸葛亮告訴他們，曹操、孫權（182-252）的壓力曾使劉備處於危急存亡之秋；直至法正幫助劉備在蜀地建立安全的基地後，劉備才轉危為安。然

³⁶ 該句話原出於《華陽國志》，見《三國志》卷三三，頁903；《資治通鑒》卷七五，頁2367。

³⁷ 《三國志》卷三三，頁903；《資治通鑒》卷七五，頁2367。

³⁸ 《三國志》卷三七，頁960。這個故事可能以一種變化了的方式成為後文要討論的郭沖一事的基礎。

後，陳壽引述諸葛亮的說法：「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³⁹ 接著，陳壽詳細闡述了諸葛亮的觀點，寫道，因為劉備的夫人是孫權的妹妹，嫁給劉備時隨身帶來一百名女兵作她的護衛，所以無論何時劉備入夫人房中，都感到戰戰兢兢、不寒而慄。在〈先主穆皇后傳〉中，陳壽讓讀者進一步了解法正的作用：孫夫人回吳國之後，在是否可娶劉瑁遺孀的問題上，法正為劉備解除疑難。⁴⁰ 但回到〈法正傳〉，我們要注意陳壽的總結：「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⁴¹

陳壽文中關於諸葛亮處理法正之失的描敘，與諸葛亮的正直執法者形象相左。在上述事件中，諸葛氏不僅拒絕請劉備約束法正，而且還以法正得劉備信任為由。從好的方面講，它削弱了陳壽對諸葛亮的評價，陳認為諸葛氏不懂得調整原則以應不同的現實情況。當然可以說，諸葛亮「每奇正智術」。⁴² 而且，〈蔣琬傳〉裡有類似的事件：因為蔣琬好飲酒而不理政事，劉備要加罪戮，但諸葛亮鑑於「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而袒護他。⁴³ 把這兩個事件合起來考慮，可以說明諸葛亮在基本原則之外，也會因一些長遠考慮而有所變通。我個人同意這樣的說法，但是同時必須承認，諸葛亮執法嚴明、公正的形象可說有點失色。例如，在《三國志注》中，裴松之加上了孫盛（約302-375年）的論述。孫盛引述史事告誡大家說，對帝王親信法外開恩總是會在政府中產生混亂，並且破壞倫理原則，因此絕不可允許放任個人私念而從別人身上獲利。總之，「諸葛氏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⁴⁴ 引用孫盛的批評而不作任何駁斥，裴松之的觀點不言而喻。

裴注中另收錄了一個相關的史事，故事敘述諸葛亮與法正就刑罰問題而相互影響。為回應法正關於減輕嚴刑峻法的建議，據說，諸葛氏引劉璋——劉備從他手中奪取了對蜀的統治——對民眾行婦人之仁，因而民眾不重法治與權威之事。為了糾正這種放縱和不敬的習氣，諸葛亮「威之（民）以法」；就是說他堅決主張欲行善政，嚴刑峻法必不可少。這種說法來自於郭沖。為了批駁郭沖的說法的正確性，裴松之寫道，法正死於劉備之前，而諸葛氏是在劉備死後才獲得行政的

³⁹ 《三國志》卷三七，頁960。

⁴⁰ 《三國志》卷三四，頁906。

⁴¹ 《三國志》卷三七，頁960。

⁴² 《三國志》卷三七，頁961；又見諸葛亮關於法正的評價，在頁962。

⁴³ 《三國志》卷四四，頁1057。

⁴⁴ 《三國志》卷三七，頁961。

控制權；因此，把這樣具體的內容和口吻歸於諸葛亮是難以想像的。郭沖說到：「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嘆。」⁴⁵ 而郭沖只是用這個說法來支持他在「郭沖一事」中對諸葛亮的評論的。正如裴松之所疑，他「未聞善政以刻剝為稱。」⁴⁶

觀察司馬光如何重新審視關於法正的故事是很有意思的。第一個故事——前文已討論過——來自於陳壽的〈法正傳〉，而第二個故事來自裴松之對〈諸葛亮傳〉的注中。將這些故事聯繫起來，司馬光沒有提到裴松之對第二個故事——即郭沖一事——可信性的異議，⁴⁷ 就將兩個故事寫進他的史書中。雖然如此，司馬光在第一個故事中省略掉陳壽有爭議的結論，並且以緩和的語辭存實。在解釋為甚麼法正的過份行為沒有被阻止時，司馬光引用了諸葛亮的反詰。諸葛氏問：基於法正的功績，為甚麼劉備要禁止他「少行其意」呢？⁴⁸ 增加了一個「少」字，就緩和了原來的引文。在第二個故事中，司馬光減低那些抱怨諸葛亮治術的人，從「君子小人咸懷怨嘆」到「人多怨嘆者」。這樣，在司馬光重新整理文獻時，焦點就更容易轉移到為諸葛亮辯護：需要「威之以法」、「限之以爵」。⁴⁹ 我想，郭沖所提諸葛亮「威民以法」之說，使司馬光傾向於忽視裴松之的異說，並且轉引郭沖之說來支持司馬光本人關於諸葛氏典範作用的整體敘事。

司馬光有選擇的組織史料，另一個明顯的例子是關於李嚴（卒於234年）與諸葛亮不和，並最終為諸葛氏排斥的故事。雖然司馬光收集了官方《三國志》中許多不同的陳述，但只要涉及到諸葛亮承認與李嚴長期交惡，或他人已疑李嚴的忠心而諸葛亮仍誤用他而自責的文字——通通被他刪去。⁵⁰ 而且，司馬光仔細記載了劉備和諸葛亮前後授予李嚴的職權。因此，這種建構式的敘事增強了裴松之

⁴⁵ 《三國志》卷三五，頁917。

⁴⁶ 《三國志》卷三五，頁917。

⁴⁷ 有評論者指出：「針對第一項，《資治通鑑》在記事中說諸葛亮『佐備治蜀』，表達出當時他只是輔佐角色；針對第二項，《資治通鑑》將郭沖所述的『刑法峻急，刻剝百姓』改為『頗尚嚴峻』，刪除『刻剝百姓』四字。」雖然可以如此理解，但我覺得這樣的說法過於曲折。

⁴⁸ 《資治通鑑》卷六七，頁2131。

⁴⁹ 《資治通鑑》卷六七，頁2131-2132。

⁵⁰ 《資治通鑑》卷七二，頁2273；《三國志》卷四〇，頁999-1000 載有陳壽所錄諸葛亮關於李嚴的奏表和裴松之所補充的諸葛亮上尚書的公文。李嚴即李平。

引用的諸葛亮所稱「何圖中乖乎！」⁵¹

懲戒李嚴也讓我們了解到諸葛亮的刑政。司馬光引用保存在裴注中習鑿齒的說法，再一次讚揚諸葛亮司法公正。不過，司馬光刪掉了習鑿齒的結論部分；在這裡，習鑿齒推論說：「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⁵² 通過刪除習鑿齒對李嚴一事所下的結論，司馬光微妙地避免把諸葛氏用刑與秦朝法家的嚴刑峻法聯繫起來。同樣，司馬光也刪掉了劉備臨終托孤時的一句話，其中提到諸葛亮曾讓劉禪（207-271）研讀的經典法家著作。⁵³ 總之，儘管從陳壽書與裴松之注中所引的段落，已為諸葛氏之刑罰治理提供了正面肯定的評價，司馬光更將用刑以獲尊重、用法以示權威的主題向前推進了一步。他刪除任何涉及法家的文字，因此諸葛亮作為司法者，要比先前官方史書中呈現的更為「儒家化」一些。

我對司馬光重述諸葛亮敘事中刑罰作用的分析，也與近來一些中國學者的研究一致。司馬光文集中的論文表明他並不提倡寬刑。⁵⁴ 鄒永賢教授在最近的著作中更大膽地提出，司馬光綜合了儒、法兩家的思想，特別是在關於刑罰的問題上。⁵⁵ 而且，張元教授的一篇論文中也已經注意到「儒家化」是《通鑑》在選取資料時頗為清楚的傾向。⁵⁶

總之，司馬光所記述的諸葛亮對法正和李嚴的態度——特別是諸葛亮在雍闓、劉封與馬謖之死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許在最初閱讀時看不出有甚麼特殊目的，甚至表現了諸葛亮性格中的陰暗面；但仔細分析卻發現最初的印象是錯誤

⁵¹ 《三國志》卷四〇，頁1001；《資治通鑑》卷七二，頁2273。田餘慶教授重新考察《三國志》的材料，比起陳壽、司馬光，他更批評諸葛亮在用人，特別是任用李嚴方面的缺點。見〈李嚴行法與諸葛用人〉，載其《秦漢魏晉史探微》，頁176-192。

⁵² 《三國志》卷四〇，頁1001；《資治通鑑》卷七二，頁2300。關於習鑿齒，見 Andrew Chittick, "Pride of Place: The Advent of Local Histor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7).

⁵³ 劉備的話記錄在《諸葛亮集》中，裴松之在注中抄錄了該話，見《三國志》卷三二，頁891；參見《資治通鑑》卷七〇，頁2214。

⁵⁴ 《溫國文正司馬公集》（四部叢刊初編本），卷二〇與二四。司馬光傳在《宋史》（北京：中華書局本），卷二〇一，頁5011。我在此感謝另一位審閱人建議我查閱司馬光的文集。

⁵⁵ 鄒永賢，《《資治通鑑》治國思想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8），頁11-24, 331-394。

⁵⁶ 張元，〈司馬光對東漢曹魏歷史的理解〉，頁77-106。

的。司馬光的敘述與既有史料之間的距離與他所描述的諸葛亮形象相契合；他描述的諸葛氏是一位嚴厲的司法治理者，以刑罰來增進社會的總體利益，並增強人們對法律的敬畏。正如在以上所舉的三個個案中，司馬光強化了諸葛亮在三位當代人物之死中所扮演的角色，藉以確保軍隊的秩序與紀律；他對諸葛亮的刑罰管理特別留意，非常微妙地與陳壽對諸葛亮的評價有所區分。

五、作為軍事戰略家與戰場將領的諸葛亮

司馬光增減陳壽《三國志》的文字，經常改變了陳壽對諸葛亮作為軍事戰略家與戰場將領的評價。雖然每次的變化不大，但聯繫起來卻很有意味，並且好像存在著一種模式或結構。與陳壽之別的一個例証便是，司馬光刪去了陳壽最後評語中一個關鍵評論：「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⁵⁷在別處，陳壽寫道，當諸葛亮第一次伐魏失敗後，「亮敗走」，但司馬光卻不把這幾個有貶義的字寫進書中。⁵⁸我這樣的說法很容易被人誤解，因為有人會覺得我以為司馬光否定了這次軍事的失敗。但事實並非如此。例如，司馬光綜合陳壽的史料，寫道，魏國將軍張郃「大破之（馬謖），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⁵⁹當然這段話可以說已經具有敗走的涵義，但我覺得司馬光所用的文字比「亮敗走」好聽，保留了諸葛亮不少顏面。司馬光就在寫「謖之未敗」的時候，也把失敗的責任歸到馬謖而不是諸葛亮身上。雖然司馬光後來說蜀「民忘其敗矣」，但這段話的上下文卻歌頌諸葛亮作為軍隊的領導，「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⁶⁰陳壽在另一處記述，第一次伐魏戰役中，眾人提議任命極富經驗的前線將領魏延率領先遣隊，但諸葛亮不聽勸告；甚至，與眾人的意見相反，把任務交給了馬謖。當然陳壽和司馬光都提到劉備臨終時對諸葛亮說馬謖言過其才，不可以大用，而且都提到街亭之戰前王平對馬謖的規勸，所以這些足以讓人瞭解馬謖的將才未得到一致認可。可是我覺得兩位史家在處理此事的方式上仍有差別。司馬光只是說諸葛

⁵⁷ 《三國志》卷三五，頁934；《資治通鑒》卷七二，頁2299。

⁵⁸ 《三國志》卷三，頁94；參見《資治通鑒》卷七一，頁2241。

⁵⁹ 《資治通鑒》卷七一，頁2241。

⁶⁰ 《資治通鑒》卷七一，頁2243。

亮沒有起用如魏延這樣有經驗的將領，而讓馬謖負責，因此司馬光遺漏了陳壽記述中隱含的指責：諸葛亮剛愎自用，無視謀士們的慧見。而且，通過在文本上強調裴注中的一個故事，司馬光認為在二二五年諸葛亮平息蜀地南部部落反叛的戰役中，馬謖提出了很有價值的建議，為平亂奠定了基礎。⁶¹ 這段故事既是諸葛氏信任馬謖的一個正面理由，又道出很難預料馬謖會在街亭違背諸葛亮的節度。總之，陳壽的敘述在評論諸葛亮無視其他將領的意見時，顯出批評的語氣，而司馬光卻撇開這些批評文字，並且還突出裴注中的故事，為諸葛氏信任馬謖辯解。

司馬光利用裴注中的各種史料，建構了諸葛亮軍事行動的正面敘事。如，在平息蜀國南部叛亂與擒拿孟獲一事中，陳壽只平淡地寫道，「三年春，亮率眾南征，其秋悉平」，就好像這是一次平平常常的戰役。他沒有涉及裴注中諸葛氏七擒孟獲的史料，但是司馬光引用了孟獲的故事。⁶² 這樣的故事顯示諸葛氏不僅巧妙地在武力上征服了非漢民族，而且也征服他們的心，使他們心悅臣服。通過利用裴注中七擒孟獲的故事，司馬光提高了這些故事的可見度，並將它們置於官方權威認可的宏觀敘事之中。

在另一處，司馬光運用裴松之的補充資料，引用其中一條魏國史料，生動而詳盡地描述了二二八至二二九年間，圍困陳倉之役中諸葛亮的攻戰之術。我承認《魏略》中記載的一個目的，大概是想揭示以下事實，也就是諸葛亮即使有比較強大的軍隊，可是二十天的圍城耗費甚多，所以最終仍不可能攻下陳倉。但是，司馬光卻把這段敘事用於另一不同目的。他刪去這條史料中的一句話，這句話呈現了圍困尾聲時諸葛氏的失敗和退縮：「亮無計，救至，引退。」⁶³ 而且，陳壽突出諸葛亮引退的時間，寫到：「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⁶⁴ 所以，在陳壽的敘述中，是即將到來的強大的魏國援兵迫使諸葛亮退兵。但司馬光的敘事改變了時間：「（郃）未至，亮糧盡，引去。」⁶⁵ 因為南鄭離陳倉還有幾百里，當然可以說「至南鄭」和「未至」陳倉沒有實質性不同。可是我覺得還有差異：在陳壽

⁶¹ 這個故事原見於《襄陽記》，見《三國志》卷三九，頁983-984；《資治通鑑》卷七〇，頁2222。

⁶² 《三國志》卷三五，頁919, 920；《資治通鑑》卷七〇，頁2222, 2224-2225。

⁶³ 細節原見於《魏略》，參見《三國志》卷三，頁95及《資治通鑑》卷七一，頁2249-2250。

⁶⁴ 《三國志》卷一七，頁527。

⁶⁵ 《資治通鑑》卷七一，頁2250。

書中，諸葛氏知道張郃因為「晨夜進」已經到了南鄭，如果急速「晨夜進」，會不久至，所以諸葛氏退兵而去。相比起來，司馬光的寫法給了諸葛亮很大顏面：魏軍「未至」的時候，他必須引去是因為他的「糧盡」了。確實，陳壽的〈諸葛亮傳〉中說：「亮糧盡而還，」⁶⁶ 因此，在其它地方陳壽也批評糧草供給不足的問題。但是，即使在諸葛亮傳中，也敘及在糧草耗盡之前，諸葛亮就為曹真(193-232)所阻之事。相反地，司馬光卻比較正面地塑造諸葛亮的形象，在他的敘事中，諸葛亮在糧草匱乏前主動出擊，因此不得不退回蜀國。司馬光重構的敘事轉變了諸葛亮失敗的原因，不是因為面對強大的魏國增援而蜀軍兵力不足，而是由於從遙遠的蜀國供應軍隊所需糧草的困難。以此為背景，下面的這句話似乎支持這個觀點：「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⁶⁷ 雖然這句話是從〈諸葛亮傳〉中來的，陳壽卻先說「亮圍陳倉，曹真拒之」，⁶⁸ 而司馬光避免這麼清楚地表明曹真已經成功擊退諸葛氏的圍困，所以他在說「亮擊斬雙」時就有了不同的上下文。換句話說，在司馬光的重構中，糧草的缺乏逼使諸葛亮退兵，這不啻意味著倘非糧草的問題，諸葛亮必定會勝利的。畢竟，即便是在撤退之中，諸葛亮也能擊敗魏軍、斬獲魏將。儘管今天的歷史學家大概會同意胡三省(1230-1302)和田餘慶教授的觀點，他們都認為諸葛亮對於攻打魏國據守的城池基本上沒有什麼成功希望。在我看來，《資治通鑑》關於這些諸葛氏軍事行動的描述，一定在多數中國人心中，形成諸葛亮確有獲勝信心的印象。

裴注中保存的史料進一步增強了二三四五年諸葛氏的最後一次伐魏戰役的戲劇性。司馬光引了其中的故事，談到諸葛亮送巾幘婦人之飾給司馬懿，想以此來激怒他，讓他不再取防禦之勢而與蜀軍決戰。⁶⁹ 另一個精彩的故事講到，起初司馬懿追擊蜀國退兵，當他以為諸葛亮仍然活著時，又如何停止追擊。如果諸葛亮還活著的話，那麼蜀軍就是假裝引退，設計謀以吸引司馬懿走出堡壘與蜀軍對陣。老百姓知道所發生的一切，就編了一句有名的諺語：「死諸葛走生仲達」。⁷⁰ 這

⁶⁶ 《三國志》卷三五，頁924。

⁶⁷ 《資治通鑑》卷七一，頁2250。

⁶⁸ 《三國志》卷三五，頁924。

⁶⁹ 這個故事出自《魏氏春秋》，見《三國志》卷三，頁103，裴松之注；引在《資治通鑑》卷七二，頁2295。

⁷⁰ 但司馬懿卻一笑釋然，說：「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故事出自《漢晉春秋》，收在裴松之注中，見《三國志》卷三五，頁927；《資治通鑑》卷七二，頁2296。

兩個故事早在唐初就寫入《晉書·宣帝紀》，因為它們可以用來讚美司馬懿的智慧。另外兩個類似的故事更明顯。一件是司馬懿預料說，如果諸葛亮西上五丈原，魏國將軍不必擔心，他們很容易取防守之勢擊退諸葛氏。另一個故事敘述了在司馬懿得知諸葛氏的工作習性後提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⁷¹前一件事顯示諸葛亮軍事的失誤，而後一件則顯示他過於事必躬親。雖然這兩件事似乎都表達負面的評價，但我認為這些故事仍足以讓人讀出另外一個結論：這四個故事合在一起，可以強調諸葛亮「死而後已」的忠心，也可以看作司馬懿肯定他的軍事才能，甚至司馬懿不願意與諸葛氏對陣。歷史小說《三國演義》也得出類似的結論。司馬光把這些故事寫入他這部朝廷編修的史書中，因此而增強了故事的可信度，也使它們藉後來的文本廣泛流傳。

司馬光所有的文字更動，都是為了強調諸葛亮作為卓越戰略家和才能橫溢的戰地指揮官的形象，我們甚且可以探討為何他引用一個看來與這種諸葛亮軍事才能正面建構相矛盾的史料。這個史料就是所謂的〈後出師表〉，它描繪了一個處於守勢、四面受困的諸葛亮，他被內部的批評與不信任所纏繞，卻還要徒勞絕望地糾集軍隊、與魏國作戰。⁷²在《三國志》以及陳壽所編的諸葛亮的集子中都未收入該表；因此，陳壽的言外之意就是否認該表的真實性。陳壽在編纂《三國志》時，能夠接觸到三國時各國的文件檔案，所以他比其他人更有資格知道該表是否偽作。雖然裴注中納入了這篇被認定是諸葛亮所作的表，但裴松之對其真實性表示懷疑。他確定該表出自吳國（222-280），而非蜀國資料。⁷³從而，裴松之含蓄地提出了一個讓人警醒的問題：一位不出名的吳國人怎能成為蜀國奏表——特別是這樣具有敏感性的奏表的唯一資料來源呢？我可以說，奏表中偏向吳國的心態相當明顯：奏表多次讚美吳國及其君主，而認為劉備攻吳是錯誤的。幾世紀以來，學者們如袁枚、梁章鉅，皆斷定所謂的後出師表「非孔明作也」。⁷⁴史學家田餘慶、鄧廣銘先生（1907-1998）都曾私下告訴我，他們也不認為這個「後出

⁷¹ 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本，1974），卷一，頁8,9。

⁷² 《三國志》卷三五，頁923-924；《資治通鑑》卷七一，頁2247-2249。

⁷³ 裴松之說該表見於《默記》，而《默記》是由一個叫做張儼（266年盛期）的人所編纂的。見《三國志》卷三五，頁924。有些學者，如 Eric Henry 不作任何批判就接受這個〈後出師表〉為真，見他的“Chu-ko Liang in the Eyes of His Contemporari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2.2(December 1992), 特別是其中的頁607。

⁷⁴ 梁章鉅，《三國志旁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頁538-539。

師表」是真的。司馬光沒有提及陳壽、裴松之或含蓄或明確的懷疑，在《資治通鑑》中竟引用了〈後出師表〉。

雖然司馬光的確引用了這篇悲嘆諸葛亮第一次伐魏之失，而可信度不高的〈後出師表〉，但他在其他地方刪掉一些史料論述，這些論述所描繪的諸葛亮是缺乏自信與決斷力的軍事將領。例如，在引用諸葛亮另一個奏表——即二二八年要求罷降三級的奏表時，司馬光沒有選錄諸葛亮嚴厲的自我批評。⁷⁵ 把這些例子並列觀之，似乎給人一種印象，即司馬光的書中有不同的矛盾說法，至少有一些尚未完全解決的衝突；因此，他的文本可以被理解為對一種單一、特定解釋的對抗。但是，考慮到司馬光敘事的大背景，另外一種解釋更為可能。去掉那些顯示諸葛亮對自己行動的批評段落，〈後出師表〉不是對自我懷疑的表明，而是堅定地忠實於最高目標的宣稱：即要把北部中國從魏國的控制下解救出來，從而最終統一整個中國。總之，對〈後出師表〉的這種解讀，較能突出司馬光在重述諸葛亮故事中的一致性。

六、架構諸葛亮故事的歷史喻象

這節我們擬討論司馬光重寫諸葛亮故事的最後一個特點，即他用歷史上一組特定人物來架構他的敘事。司馬光運用歷史人物來定位諸葛亮的形象反映了一種儒家的偏好，即在討論政事和哲學所持的不同價值和取向時，用獨特的歷史與制度的術語作為概念性象徵，如「王」和「霸」。⁷⁶ 我們可以把司馬光詮釋特定的歷史人物稱作「塑造模範」(modelling)。若以此術語來指司馬光將諸葛亮與以前的大臣相比，並非我的原意所指：即司馬光把諸葛亮塑造為一個儒將與執法典範。而且，司馬光似乎以早期歷史名臣的比喻來建構諸葛亮形象，所以我將以「比喻」來討論諸葛亮的形象。

⁷⁵ 例如，雖然司馬光引用了諸葛亮於二二八年所上要求降職三級的奏表，但他並沒有把其中諸葛亮強烈自責的文字也收在其中。見《三國志》卷三五，頁922；《資治通鑑》卷七一，頁2242。

⁷⁶ 我在一篇文章中討論過有關這兩個象徵概念的運用，見“The Development of Tension Between Virtue and Achievement in Early Confucianism: Attitudes Toward Kuan Chung and Hegemon (Pa) as Conceptual Symbol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1.1(January 1981): 17-28. 我在《功利主義儒家：陳亮對朱熹的挑戰》和《朱熹的思維世界》中對此繼續作了討論。

在為諸葛亮設立的比喻中，司馬光所書與陳壽所用的比喻，以及與劉禪在二六一年左右及李興於三〇五（或306）年所用的比喻，有何關連呢？李興所寫碑銘錄在裴注中，他把諸葛氏看成聖賢的大臣——神話式的伊尹（公元前十六世紀）和傳說中的周公（約卒於公元前1033年），這兩人奠定了三代時的兩個朝代之基，⁷⁷但司馬光並沒有提到這個碑銘。而且，司馬光也未採用劉禪悼文中把諸葛氏當作聖賢之臣的說法，劉禪的悼文見於陳壽的〈諸葛亮傳〉。劉禪在悼文中認為諸葛亮是唯一結合了文武兩方面領導才能的人。他在評價諸葛亮發動的伐魏戰役時，宣稱：「唯君體資文武，……如何不吊，事臨垂克，遘疾隕喪！」⁷⁸司馬光唯一涉及到劉禪悼文之處是引用文中的諡號。⁷⁹但是，司馬光塑造的諸葛亮形象看起來和劉禪最先美化的形象頗為相似：強調諸葛氏的軍事能力，相信只是因為諸葛亮早死才導致戰爭之敗。然而，作為一個理智而現實的歷史家，司馬光沒有附和劉禪，把諸葛亮誇大至伊尹或周公的地位。

如同陳壽一樣，司馬光在建構諸葛亮的敘事中，以諸葛氏與近期賢君的輔臣相比擬，作為開始與結尾。當他開始把諸葛亮引入敘事中時，司馬光引用諸葛氏自比為管仲（公元前645年卒）、蕭何（公元前193年卒）的話。⁸⁰管仲的建議使得歷史上第一位霸主齊桓公（公元前685-643年）能夠領導中原諸侯國對抗南方逐漸強大的楚國，以維護周朝的秩序。蕭何輔佐漢朝的開創者劉邦（公元前256-195年）。這些著名的大臣幫助歷史上的君主治國平天下。但是，他們仍然未能達到伊尹、周公的理想。

司馬光引用了陳壽最後的評語，其中諸葛亮被比作這兩位歷史上的大臣：「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⁸¹緊接著這個比擬，司馬光藉由引用陳壽所寫另兩位蜀將使之得以強化。李嚴那時還在徙放之中，據說他聽聞諸葛亮之死後就痛心而亡。⁸²廖立（234年

⁷⁷ 《三國志》卷三五，頁936-937。關於周公，見 Edward L. Shaughnessy, "The Duke of Zhou's Retirement in the East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Minister-Monarch Debate in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his *Before Confucius: Studi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pp. 101-136.

⁷⁸ 《三國志》卷三五，頁927。

⁷⁹ 《資治通鑑》卷七二，頁2298。

⁸⁰ 《資治通鑑》卷六五，頁2074。

⁸¹ 《三國志》卷三五，頁934；《資治通鑑》卷七二，頁2299。

⁸² 《三國志》卷四〇，頁1000；《資治通鑑》卷七二，頁2299。

卒)因爲不斷怨謗被諸葛亮削職徙放,但是當他聽到諸葛亮的死訊時,非常傷心。現在他已經無望能被諸葛亮從邊區召回,哭著說道:「吾終爲左衽矣!」⁸³用這個典故,廖立把諸葛亮比成管仲:管仲因保護中原不被蠻夷侵入、使人們不必像蠻夷一樣穿著左衽的衣服而受到孔子的稱讚(《論語·憲問第十四》)。通過《三國志》不同傳記中的評論融合進一個權威的敘事,司馬光再一次凝聚了散見於陳壽書中對諸葛亮讚美的文句。

爲免讀者可能錯過這一點,司馬光又寫進習鑿齒的陳述,這個陳述強化了把諸葛亮比於管仲的歷史比喻。司馬光好像把習鑿齒的話,當作他自己對諸葛氏的最後評價,他把習氏的陳述從裴注中提出來,並將它提昇到主體敘事文本之中:

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⁸⁴

最後一句可能含蓄地提示經典儒家(如《孟子·盡心上》)所謂的仁者無敵。

我們之所以認爲以上所述便是司馬光對諸葛亮的蓋棺論定,另一個原因還在於,從孔子讚揚管仲的語境來看,這個比擬強化了司馬光欲以諸葛亮形象來塑造現實世界中典範儒家刑政的用心。雖然法與刑已是陳壽論諸葛亮的要點,司馬光在他的敘事文本中使這一方面更爲突顯。而且,對於任何暗示諸葛亮重刑法與嚴酷法家傳統之間有關聯的論述,即便是陳壽所言,司馬光都將它們排除在敘事之外。將這些例子與司馬光把諸葛氏描繪成儒將的榜樣並列時,司馬光是想給後人樹立一個現實的儒家治術的榜樣。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司馬光是道學傳統的奠基者之一,⁸⁵他並未將諸葛亮樹立爲聖賢榜樣,而只滿足於刑罰治理者與軍事將帥的典範。現在我們就轉向這個問題。

⁸³ 《三國志》卷四〇,頁998;《資治通鑒》卷七二,頁2299。

⁸⁴ 《三國志》卷四〇,頁1001;《資治通鑒》卷七二,頁2300。

⁸⁵ 對道學的傳統理解或者否認或者降低司馬光在道學中的作用,原因在於原本包容甚廣的道學群體後來被縮小爲朱子學派——尤其是在一三一五年元朝拔高朱熹思想和經注成爲國家正統以及在一三四〇年代官修《宋史》中採用較窄的道學範圍之後。但是,司馬光在道學運動中的作用在南宋得到廣泛承認。見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

七、從對諸葛亮敘事中見司馬光之用心

爲甚麼司馬光會如此刻意地將諸葛亮建構爲既是有才的儒將、又是典範儒家刑政者呢？司馬光所處時代的軍事情況，提供部分的答案。宋朝處在危急之秋，不像以前主要的朝代，宋朝未能控制長城之內的所有地區。西夏（1038-1227）盤踞西北的部分地區，遼（916-1125）則控制包括今天北京在內的地區。而且，這兩個宋的競爭者，和宋朝一樣聲稱是唐朝（618-906）的合法繼承者。面對如此軍事與文化上的挑戰，司馬光提出兼具儒家價值和擅長軍事指揮的理想，不是甚麼值得驚奇的事。的確，與通常所謂宋代重文輕武的結論相反，司馬光主張文武合一，因爲從古代理想一直到孔子，文、武都是不可分割的。他批評唐代專爲姜太公興立祀典，他認爲這樣便暗含著限孔子於「文」之一途。⁸⁶ 宋在軍事上弱於遼和西夏，所以宋朝的士大夫，如司馬光，就自然地去召喚道德的力量。正如劉子健（1919-1993）教授和我在其它地方分別表述過的，在金國於一一一五年征服遼、一二二七年征服北宋之時，對於宋朝的忠臣，儒將的理想更加具有吸引力。⁸⁷ 關於理想的另一方面，司馬光個人的政治鬥爭，爲他將諸葛亮塑造成維護現實而儒家化的刑與法的榜樣，提供了一個良好的背景。在編纂《資治通鑑》過程中，由於司馬光在王安石（1021-1086）變法中持保守反對的立場，曾被摒棄於權力機構之外。⁸⁸ 司馬光在王安石新法與失敗的政策之間，尋找歷史類比。而且，他將王安石所推行的法度，和受法家傳統影響的那些酷吏的嚴刑峻法聯繫起來。聲稱

⁸⁶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頁6795-6796；黃進興，〈武廟的崛起與衰微（七迄十四世紀）：一個政治文化的考察〉，發表於“China's Future and Past,” 普林斯頓大學余英時教授榮退國際會議，二〇〇一年五月，會議論文集將由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感謝黃進興先生示稿。

⁸⁷ 田浩 (Hoyt Cleveland Tillman), “Ho Ch'ü-fei and Chu Hsi on Chu-ko Liang as a 'Scholar-General',” *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25(1995): 77-94; Yang Dequan and James T. C. Liu, “The Image of Scholar-Generals and a Case in the Southern Sung,” *Saeculum* 37.2(1986): 182-190.

⁸⁸ 關於王安石變法與司馬光的反對，見 Robert M. Hartwell, “Historical Analogism, Public Polic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Eleventh- and Twelfth-Century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6.3 (February 1971): 690-727; James T. C. Liu, *Reform in Sung China: Wang An-shih (1021-1086) and his New Polic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eter Bol,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及羅家祥，〈北宋黨爭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參見冀小斌 (Xiao-bin Ji) 博士論文中對處於政治背景之下的司馬光思想的新評價。

諸葛亮嚴格而公正的刑政，是儒家經世之術的運用，正可看成是那些主張用人與用法並重者的代表；因此，司馬光藉此來與那些只用法不用人者相區別。把諸葛亮這樣的人物塑造成在處理經世、戰略、刑政等問題上的「儒家化」的榜樣，或許也看作對抗王安石，同時使他的新法顯得更接近法家。陳明鈺教授認為，司馬光的史書受到當時朋黨政治的影響，在這一點上我同意他的看法，但是，我的個案研究卻反對他所認為司馬光在與敵國的軍事外交問題上採取消極立場的結論。而且，儘管陳教授強調司馬光立志於維護政治之中的「秩序」和等級，我的研究卻表明，與陳教授所刻劃的司馬光堅持消極、保守政治的理想相比，法與刑在司馬光的思想中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⁸⁹

不過，我並非要論證司馬光的史書只是受他的政治目的左右，也不是論證他要歪曲歷史以爲政治鬥爭的武器。而是，司馬光的歷史著作與其社會政治觀點之間的協調。至少在諸葛亮一例中顯示他在對文獻資料與史學的看法中，自始至終是一致的。不用說，傳統中國的史學家必然不會公然倡導爲政治而曲解歷史，司馬光亦不例外。陳教授和 Pulleyblank 教授都已經強調了司馬光在《考異》和與范祖禹書中所設定的標準與方法，Pulleyblank 教授還把這封寫給范祖禹的書信譯成英文。⁹⁰ 但是，正如我們對司馬光運用史料的考察所表明的，有些現代學者，如 Pulleyblank，認為司馬光所努力並體現的高標準，在實際的歷史書寫和史料運用時，卻並不能一直與之相符。有人或許喜歡在討論偉大的史學家時，仍然著重於他們作史的「標準」或指導原則，而我卻認為分析這些史家實際上如何寫史也非常重要。即便最後圖象中的細節具有複雜性、包含細微的差別，並表現出作史者不甚純正的動機或方式。觀察真正的實踐和過程，通常比注意那些飄渺的理論，或對理想標準的解釋更有意義。

再回顧我們對司馬光史學的發現，可以看到他自由而有選擇性地取捨史料時的一種模式。儘管有一群史學家協助，《通鑑》編纂的原則卻是司馬光制定的，他不止密切監督整個編纂過程，作最後的定稿。他對全書的完稿負有全責，而我們可以合理地化約說，敘事的成品乃歸屬於司馬光。正如我們在討論其文本所顯示的，在歷史敘事的很多地方他加入了自己的話。在其它地方，雖然司馬光可能引用了一些無法確定作者並已佚失的資料。但由於在多處都有這樣的插入文字，

⁸⁹ Ming K. Chan, pp. 20-25, 30-32.

⁹⁰ Ming K. Chan, pp. 25-29; Pulleyblank, pp. 154-158, 160-166.

並且與司馬光自己的解釋模式相一致，所以這些部分也不太可能是出於其他作者，很可能就是司馬光自己的文字。司馬光在自己的一些評論和評價之前，都寫上「臣光曰」等作標誌；而與這些地方不同，在敘事中明顯插入自己文字的地方，卻沒有這樣的標誌。因此，他那細微而且富有創造性的改變，融進了宏大歷史敘事之中，而成為後代史家和學者的主要文獻資料。如，羅貫中（約1330-1400年）的歷史小說《三國演義》就採用了司馬光的說法，認為諸葛亮在雍闓之死中起到作用；而且，小說還就此加以推演，形成了另一個有趣的故事，描繪諸葛亮作為軍事戰略家的聰明才智。⁹¹

八、最後的思考

在重建諸葛亮故事中，司馬光不僅廣從以前的文獻中逐字抄錄史料，而且還相當自由地在新文本中加進自己的文字。他運用「剪貼式」的方法摘錄史料，納入自己編寫的史書，並儘可能保持史料原貌，在《資治通鑒》的編纂中，是非常顯著的，以致於人們一般認為他極忠實於文獻史料，不作任何的偏離。然而，在引用陳壽的《三國志》與裴注時，司馬光也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而現代學者很少承認中國傳統史學中存在著這種自由。與我的看法相比，同行們傾向於認為司馬光在語言和文獻上較為保守；但是，我已試圖強調司馬光如何有效地利用歷史來倡導他的觀點和社會政治目標。司馬光重建歷史顯然是為了用過去來服務現實、規劃未來。事實上，司馬光史書的功用，得到了皇帝的認可，並將該書易名為《資治通鑒》。皇帝肯定司馬光的歷史是一面「鏡子」，容易使人們認為司馬光的史書就像鏡子一樣沒有任何的偏見，也沒有歪曲和改變過去的史實。但是至少在他的諸葛亮敘事中，我們檢視出司馬光的政治、文化目標，我們是否仍舊應當繼續假定他的「鏡子」單一、完全、準確地反映了過去的史料與文獻呢？雖然某些單獨的事例，如讚揚諸葛氏殺雍闓，可能看起來沒有甚麼重要目的，但我們對他的文本自由度的研究，表明這樣的細節，非常符合司馬光敘事中其他細節所塑造諸葛亮的總體形象。

司馬光一面是保守地遵循早期文獻，一面是自由地添加內容，雖然這兩方面可能看起來截然對立，甚至相互矛盾，但我認為與單獨使用某一種方法相比，將

⁹¹ 羅貫中，《三國演義》第八七回。

二者綜合運用會產生更有效果的歷史著作，特別是因為許多傳統中國的讀者已經閱讀並相當熟悉陳壽的史書和裴松之的注。一方面，司馬氏還必須非常小心運用這些史料，因為大家對這些文獻的記憶，對他所能偏離的程度作了相當的限制。另一方面，他廣泛而熟練地引用這些共有資源，一定提高了他的歷史敘事的可信度和權威性。因此，在這部由取捨文獻資料而架構起來的巨著之上，司馬光所作的添加，如果是審慎的話，將使他的敘事成為有助於自身政治文化目標的一項有力工具。

除了增進對中國歷史變化的解釋，及掌握其背後的基本因素或力量之外，仔細研究像司馬光《資治通鑑》一類的中國傳統史書以及它們是如何寫成的，或許能提昇我們自己對歷史寫作藝術本身的鑑賞。例如，當一個美國人說：「你已成為歷史」(You're History) 時，你就被降低到死亡或不重要的地位。與此相反，中國人傳統上把成為歷史看成是正面的，是將某人放入一個承先啓後的文化傳承之中。在數十年與中國、歐美史學家的交往中，我有很強烈的印象，即中國人（比起歐美人）中國人依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保持這種認識：歷史肯定了一個人在學術源流和文化遺產中的位置。⁹² 司馬光重建諸葛亮的故事——特別是選擇採用以前文獻中的某些詞彙，同時在那些變動的地方自由添加自己的文字——提供了一個生動的例子，顯示傳統的中國學者既努力忠實於傳統，又試圖把自己的價值鑄刻在歷史與文獻的傳統之中。司馬光透過重寫歷史和重建傳統，而將自己以及他所認為最適用於他的時代和後代的思想包括進去，他表達了對歷史傳統最高的尊重；他希望能繼續歷史中他所認為的榜樣。

再者，Peter Novick 把追求客觀性的「崇高夢想」(that noble dream) 歸於很多美國的史學家；⁹³ 如果借用 Novick 的語彙來刻劃司馬光歷史著述的抱負，我們的分析指出，司馬光的「崇高夢想」就是在根據史料重建過去歷史時的真誠與嚴肅。我想指出，真誠對司馬光的思考、教學非常重要。據記載，他的一個學生五年來跟他所學的只是一個「誠」字，⁹⁴ 在這裡，我對本文中提及的其他史學家的真誠，並未暗含任何判斷。這個學生的其他方面都被「誠」所掩蓋，這無疑是

⁹² 我的這種認識在與 ASU 同事 Timothy Wong 教授的談話中得到強化，他在談話中闡述了類似的看法。

⁹³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⁹⁴ 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本，1983），卷二〇，頁156。

一種誇大，但是真誠、不虛假的重要地位因此而被顯著地強調了。大多數學者接受朱熹的求道之誠，相對而言，儘管司馬光創造性地重建了文本和傳統來符合自己的目的，我們更應接受他的真誠，因他對資料的改變看起來比朱熹要少得多。雖然司馬光非常明顯地使歷史文獻屈從於他認為是合理的標準之下，比起 Hobsbawm 和其他學者所寫的那些「發明傳統」或「創造歷史」的人，司馬光更加受到文獻的限制。如果處理歷史文獻時的誠實，被看成是史學家的一個現實的「中庸之道」(golden mean)，那麼我們就可以認為，司馬光的歷史取向比那些追求歷史客觀性或探究歷史創造者——尤其現代史學家有時把這些觀點推到極端——更為接近這個「中庸之道」。這一對待文獻的誠實和尋求歷史時的真誠，實際上是相當嚴格、難以實踐的（就像我們在研究司馬光的歷史中所顯示的）。然而，如果某人的歷史著作想努力達到這個標準，其他人或許會像看待司馬光的史書一樣，把它當作對處理社會和政治問題有用的「鏡子」。

（本文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通過刊登）

附記

雖然我有關諸葛亮如何被塑造成英雄形象的研究計畫仍在進行之中，我想在此向下列機構表示感謝，感謝他們為該項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經費：Academy of Sciences' Committee for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 Fulbright-Hays Program;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國立中央圖書館的漢學研究中心；蔣經國基金會；及 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我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這篇文章的初稿發表過講演，後來在暨南大學、臺灣大學也作了同樣的報告，我在此感謝三個機構的同行的參與及對本文的批評。四位審查人，包括張元教授，就本文提出了一些反對意見和問題，使我有機會進一步改進我的論證。感謝姜長蘇同學幫忙翻譯英文稿子；也感謝王德毅教授與我的兒媳吳玉華修改錯字。老友黃進興教授與王明珂、陳熙遠、陳玉美等先生修飾我文章裡過份的洋味。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論語》，四部叢刊本。

司馬光，《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新校標點本，1956。

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集》，四部叢刊初編本。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新校標點本，1959。

朱熹，《朱子文集》，臺北：允晨文化出版社，2000。

朱熹，《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新校標點本，1986。

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新校標點本，1974。

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

脫脫主編，《宋史》，北京：中華書局，新校標點本，1973。

常璩，《華陽國志》，四部叢刊本。

陳壽，《三國志》，裴松之注，北京：中華書局，新校標點本，1959。

陳壽，《諸葛亮集》，北京：中華書局，1965。

盧弼，《三國志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2；1957年古籍出版社的重印本。

羅貫中，《三國演義》，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嚴衍，《資治通鑒補》，1876年刻本。

二、近人論著

田浩 (Hoyt Cleveland Tillman)

1996 《朱熹的思維世界》，臺北：允晨文化出版社。

1997 《功利主義儒家：陳亮對朱熹的挑戰》，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8 〈諸葛亮論：分析陳壽的《三國志》和裴松之的注〉，發表於臺北中央圖書館舉辦的「魏晉南北朝學術」國際研討會，將刊在其論文集。

田餘慶

1993 〈李嚴行法與諸葛用人〉，載於其《秦漢魏晉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

1993 〈論輪台詔〉，載於其《秦漢魏晉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

周一良

1963 〈北朝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載於其《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

張元

- 1975 《宋代理學家的歷史觀：以《資治通鑒綱目》為例》，國立臺灣大學博士論文。
- 1996 《司馬光對東漢曹魏歷史的理解》，載於《宋史研究集》冊二四，臺北：國立編譯館，頁77-106。
- 1997 〈試論《資治通鑒》的開篇〉，載於田餘慶等主編，《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梁章鉅

- 2000 《三國志旁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黃進興

- 2001 〈武廟的崛起與衰微（七迄十四世紀）：一個政治文化的考察〉，發表於“China's Future and Past,” 普林斯頓大學余英時教授榮退國際會議，2001年5月，會議論文集將由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

鄒永賢

- 1998 《《資治通鑒》治國思想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錢穆

- 1971 《朱子新學案》，臺北：三民書局。

羅家祥

- 1993 《北宋黨爭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

三、英文書目

Beasley, W. G. and E. G. Pulleyblank, eds.

- 1961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l, Peter (包弼德)

- 1992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han, Hok-lam (陳學霖)

- 1984 *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 Discussions under the Jurchen Chin Dynasty (1115-1234)*.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Chan, Ming K. (陳明鈺)

- 1974-75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Tzu-chih t'ung-chien: A Survey," *Monumenta Serica* 31: 2-38.

Chittick, Andrew

- 1997 "Pride of Place: The Advent of Local Histor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ohen, Paul

- 1996 *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ujitani, Takashi

- 1996 *Splendid Monarchy: Power and Pageantry in Modern Japa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artwell, Robert M.

- 1971 "Historical Analogism, Public Polic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Eleventh- and Twelfth-Century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6.3: 690-727.

Henry, Eric

- 1992 "Chu-ko Liang in the Eyes of His Contemporari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2.2: 589-612.

Hobsbawm, Eric and Terence Ranger eds.

- 1995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rpt. Canto ed.

Jensen, Lionel M. (詹啓華)

- 1995 "Wise Man of the Wilds: Fatherlessness, Fertility, and the Mythic Exemplar, Kongzi," *Early China* 20: 407-438.
1997 *Manufacturing Confucia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Liu, James T. C. (劉子健)

- 1959 *Reform in Sung China: Wang An-shih (1021-1086) and his New Polic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Novick, Peter

- 1988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ulleyblank, E. G.

- 1961 "Chinese Historical Criticism: Liu Chih-chi and Ssu-ma Kuang," in Beasley and Pulleyblank, eds.,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i Xiao-bin (冀小斌)

- 1998 "Conservatism and Court Politics in Northern Sung China: The Thought and Career of Ssu-ma Kuang (1019-1086)."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Schirokauer, Conrad (謝康倫)

- 1993 "Chu Hsi's Sense of History," in Robert Hymes and Conrad Schirokauer, eds., *Ordering the World: 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ung Dynasty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haughnessy, Edward L.

- 1997 "The Duke of Zhou's Retirement in the East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Minister-Monarch Debate in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his *Before Confucius: Studi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Tillman, Hoyt Cleveland (田浩)

- 1981 "The Development of Tension Between Virtue and Achievement in Early Confucianism: Attitudes Toward Kuan Chung and Hegemon (Pa) as Conceptual Symbol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1.1: 17-28.
1995 "Ho Ch'ü-fei and Chu Hsi on Chu-ko Liang as a 'Scholar-General'," *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25: 77-94.

Yang, Dequan and James T. C. Liu

- 1986 "The Image of Scholar-Generals and a Case in the Southern Sung," *Saeculum* 37.2: 182-190.

History and Culture: Sima Guang's Reconstruction of Zhuge Liang's Story

Hoyt Cleveland Tillman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Contemporary scholars often regard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ans as having either liberally 'invented traditions' or conservatively pasted together quotations from earlier sources. In response, I undertake a case study not only to explore the tension between textual freedom and restraint within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but also to suggest some of its complexity.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 (*Zizhi tongjian*) because it has endured as an exemplary achievement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Sima Guang (1018-1086) was entrusted by the Song emperor to compile this gr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his veracity and judicious use of sources has earned him a reputation as one of China's greatest historians. Sima Guang was fortunate to obtain the assistance of three outstanding historians: Liu Bin (1023-1089), Liu Shu (1032-1078), and Fan Zuyu (1041-1098). Although these colleagues organized the materials and played major roles, Sima Guang articulated the guidelines, closely supervised the project, and was ultimately responsible; thus, I will simply speak of the work as his. What matters is not which member of the team might have initiated a particular change of wording, but rather the impact of changes between source texts and the grand narrative. I scrutinize the text, compare it against its sources, and analyze apparent patterns evident in the selection and exclusion of words from earlier sources.

The focus of the case study is Zhuge Liang (181-234), the principal advisor and administrator of Liu Bei's (162-223) Shu-Han (221-263) state in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220-265). Besides being an intriguing subject in himself, Zhuge Liang was chosen because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his era had been preserved and evaluated by two exceptional dynastic historians. With access to the archives and libraries of all three states, Chen Shou (233-297) had compiled the officially sponsored history, the *Chronicle of the Three Kingdoms* (*Sanguo zhi*). Pei Songzhi (372-451) collected over two hundred additional sources, incorporating them into his commentary to Chen Shou's official history. Although some of Pei Songzhi's supplemental sources had obviously been rejected by

Chen Shou and were even criticized by Pei Songzhi himself, these sources provided a treasure trove for Sima Guang.

Despite some apparent inconsistencies within Sima Guang's narrative, my reading looks for internal consistency—especially regarding certain words that he chose to omit when copying from earlier officially endorsed texts and the words that he apparently added to complete his narrative construction. At the onset, I should concede that many of these changes may appear either as too minor to have been discussed in Sima Guang's *Kaoyi* (Investigation of Discrepancies) or as merely stylistic changes to enhance the flavor and strength of the narrative. Nonetheless, I look for patterns into which such seemingly small changes fit together to form a big picture. Indeed, I show that the larger context of his portrayal of Zhuge Liang enables us to understand and make sense even of passages and language about Zhuge Liang that, at first, seem at odds with our widely held impression that Sima Guang had a positive view of Zhuge Liang.

Sima Guang apparently manipulated his sources to enhance Zhuge Liang's responsibility for three deaths: Liu Feng's in 220; Yong Kai's in 225; and Ma Su's in 227. Zhuge Liang's enhanced role in those deaths, as well as Sima Guang's account of Zhuge Liang's stance toward Fa Zheng and Li Yan, might appear on first reading to serve no particular purpose or even to convey a dark side of Zhuge Liang's character. Closer analysis shows Sima Guang's departures from known sources are compatible with his own depiction of Zhuge Liang as a stern administrator of justice who meted out punishments both for society's greater good and for the military's enhanced discipline.

Another significant contrast with Chen Shou's work is Sima Guang's tone and language dealing with Zhuge Liang's military campaigns. By drawing from Pei Songzhi's commentary such stories as Zhuge Liang's capturing and releasing Meng Huo seven times, Sima Guang elevated the visibility of these stories and placed them in an authoritative position in the official grand narrative. By avoiding some of Chen Shou's language, such as "Liang fled in defeat," Sima Guang presented Zhuge Liang as more actively pursuing his military objectives. Thus, his narrative probably encouraged later Chinese impressions that if Zhuge Liang had not died so soon, he might have won. Sima Guang's portrayal of Zhuge Liang as a Confucian scholar-general reflects the military challenges that Chinese faced in his era.

Projecting a figure, like Zhuge Liang, as a “Confucianized” model for dealing with problems of governance, strategy,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law also perhaps served to counter Wang Anshi (1021-1086) and to make Wang’s methods appear more like the *Realpolitik* Legalists. Although I concur with Professor Ming K. Chan that Sima Guang’s history was influenced by the factional politics of his day, my case study counters his view of Sima Guang having a passive stance in military matters. Moreover, even though Professor Chan emphasized Sima Guang’s commitment to maintaining “order” and hierarchy within the government, my case study suggests that law and punishments played a much larger role than was evident in Professor Chan’s image of Sima Guang as upholding an ideal of a passive and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Nevertheless, I am not arguing that Sima Guang’s history was merely dictated by his political agenda. Rather, the compatibility—at least in the case of his writing on Zhuge Liang—between Sima Guang’s historical writing and his sociopolitical standpoint suggests a consistency in viewpoint informed his approach to textual sources and historiography. Even though Sima Guang’s conservative adherence to earlier texts and his liberal interpolations may appear diametrically opposed or even contradictory, I think that his two methods, when combined, yielded a far more effective historical work than either method used in isolation would have done, especially because many Chinese readers had access to, and considerable familiarity with, Chen Shou’s history and Pei Songzhi’s additional sources.

In short, if we could borrow Peter Novick’s phrase describing many American historians as having “that noble dream” of objectivity, we might say that this analysis of one major part of Sima Guang’s narrative suggests that his dream or aspiration was sincerity and seriousness in re-constructing the past from textual sources. The standard—honesty with texts and sincerity in approaching the past—is (as evident in our excursion into Sima Guang’s history has shown) really quite rigorous and difficult to practice. Yet, if one’s historical writing strives for that standard, others might regard it, as they have Sima Guang’s, as a useful “mirror” or “admonition” to aid in addressing problems in society and polity.

Keywords: Sima Guang, *Zizhi tongjian*, historiography, Zhuge Liang, *Sanguo zhi*

讀田浩教授〈史學與文化思想：司馬光對諸葛亮故事的重建〉一文

張 元

田浩教授的這篇論文，目的在於表彰司馬光在史學上的成就，指出司馬光藉資料的選取與增添，展現出別有風貌的解釋模式。田浩教授很清楚，重新肯定並贊揚司馬光的史學成就是不能用過去那種史學史的、書目學的，好像張須在《通鑑學》中的方法，而是要另闢蹊徑。我們看到田浩教授的方法，是文本的對讀，用他自己的話：「詳細比較司馬（光）的敘事及其資料來源來思考司馬（光）的史學。」簡單說來，就是把通鑑本文與可能的資料來源加以對讀，然後再對差異之處提出解釋。這實在不是一個新方法，古人讀通鑑，若有可能，多與正史對讀；本人近年在大學歷史系擔任「資治通鑑選讀」課程，亦採用此法。對讀當可發現一些不同的地方，解釋何以不同也就是一個必須的工作，多方思考的結果，對於《通鑑》也就有了進一步的理解。不過，這種方法應該是研究《通鑑》之時，所能採取的最為有效的手段，比起引錄幾段「臣光曰」，略加發揮闡釋，當然是深刻細密得多。

田浩教授對讀有關諸葛亮的「文本」，得到怎樣的新解釋？如果我的了解沒有大誤，司馬光筆下的諸葛亮，至少有兩項特點，一是儒家刑政者的榜樣，二是擅長軍事指揮的儒將。如果說，《通鑑》中的諸葛亮具有這兩項明顯的形象，我相當同意。「儒家化」是《通鑑》在選取資料時頗為清楚的傾向，我在〈司馬光對東漢曹魏歷史的理解〉一文中舉出一些例子加以說明，諸葛亮的事蹟亦可作如是觀。不過，如果讓我來作同樣的對讀工作，藉以勾勒出《通鑑》中諸葛亮的形象，我會從撰述者企圖把諸葛亮寫成怎樣的一個人物來思考，看看撰述者如何選取資料、如何組織資料，是否成功地把一個人物很生動地呈現出來。我的意思只是說，相同的著手方法，往往可以得出很不一樣的結果，我並不認為如果我來做這個工作，一定會做得比田浩教授好。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問題還是在於對《通鑑》編寫的基本認識上。我認為撰述過程中，司馬光的主要助手，劉攽、劉恕、范祖禹扮演重要角色，《通鑑》的成就主要來自這三位傑出的歷史家，這一點與田浩教授的看法很不相同。我的這個想法也是從通鑑與正史等文本對讀中得到的。如果我們仔細對讀這些資料，不難發現通鑑文本所做的選材工作，也就是從正史等資料中所做的選錄與編組，分量相當繁重，但成果卻十分出色。這些工作幾乎是撰寫《通鑑》的過程最爲重要的部分，是誰著手來做的呢？我想一定是斷代史的專家，既對有關資料甚爲熟悉，而且心思細密，組織能力很強，甚至在自己心中對於一代歷史的發展演變已經有了整體的藍圖。如果不是這樣的專家，不大能夠做出如此精美的作品。我不認為這些工作出自司馬溫公之手，一來工作量太大，不是一個人三天一卷能夠做得完。二來劉攽、劉恕等人不做這些事的話，他們做什麼呢？把所有資料依照年代順序製成長編，實在不需要傑出的史學家協助，他們應該還做了一些更爲重要的工作。三是我感覺司馬溫公的思辨分析能力並不很強，「臣光曰」的議論應該能夠反映溫公對史事的解析，也顯示出溫公思考方式簡要、明快的特色，抽象的思考與推理都不是他所擅長。我在〈試論《資治通鑑》的開篇〉（載於《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中稍作說明。當然，我也同意田浩教授所強調，司馬光對「全書負有最終的責任」，《通鑑》全書都是在他的審定下完成，他就是《通鑑》的作者，《通鑑》的內容就是司馬光的史學表現。但是，如果從田浩教授提出的另一觀點：「分析這些史家實際上是如何寫史的也非常重要」來看，情形又不一樣了。劉攽、劉恕、范祖禹的一些基本理念，如「儒家化」或反對王安石的新法，與司馬溫公沒有什麼歧異，他們在選材、編組之時也與溫公商量討論，互相交換意見，應是可以想像的事。不過，我們若仔細去想，《通鑑》的文本是如何從正史等資料中選錄、編輯、改寫而成的，我總覺得劉攽等人似乎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田浩教授認為司馬光「在歷史敘事的很多地方加入了自己的話。」是這樣麼？我們對讀資料，發現《通鑑》一字不易直抄原書者不多，加以改寫存其大義而更爲精簡有力者不少，這種情形應該不能算是「加入了自己的話」，儘管改寫之後，語氣輕重，甚至敘事焦點都因而有所不同。過去認為《通鑑》的編著，資料搜集十分宏富，下筆之時態度嚴謹，言必有據，到今天大部分的歷史學者依舊相信這樣的說法。這裡可以舉兩個例子，看看現代學者的認知。周一良在〈北朝的民族問題與民族政策〉一文中，談及山胡，引用《晉

書·劉元海載記》時，提及：

通鑑八五晉惠帝永興元年（304）紀載此事，「降同編戶」以下有這樣一段：「今吾眾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首就役，奄過百年。」這幾句話不見於載記和湯輯十六國春秋。我猜想是崔鴻的原文，唐修晉書時省略，而司馬溫公時還未亡佚，所以錄入通鑑。

周一良的這篇文章寫於半世紀之前，所述資料又是晚於三國，代表性似乎不大。茲再舉一例，田餘慶的〈論輪台詔〉，其中也談及《通鑑》的資料來源：

《資治通鑑·漢紀》征和二年，有一長段敘述巫蠱之獄始末的文字，內容非常重要，但不見於《史》、《漢》及今存北宋以前其他有關史籍。……《通鑑》這段漢武帝懲「亡秦之迹」的文字去古已遠，現在查不出更原始的出處，因此出現了是否可信的問題。在我看來，《通鑑》資料取舍原則是無微不信，有異則考明之，嚴謹而不苟且，這是古今史界所公認的。所以我相信這段文字必有可靠根據。年代去司馬光不遠的朱熹是相信《通鑑》這段話的。……朱熹深諳司馬光的學識，也了解北宋時古籍存佚情況。他對於此段史料的鑒別，其權威性自然要大大超過今人。

田餘慶此文收錄於氏著《秦漢魏晉史探微》，一九九三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我相信他的推斷，也相信他所說：「《通鑑·漢紀》出於劉攽之手，劉攽敘巫蠱問題，取材和編排最具匠心。」田浩教授大文中提及不少英文論著，對於隱匿於中文史學論著中有關《通鑑》資料的論述，可能較少接觸，其實這一類的論點還可以找到一些，而且都很接近。舉出兩個例子，僅供田浩教授參考，並不表示「古今史界所公認的」必然就是正確無誤。

田浩教授在大文中一再強調司馬光在敘事時加入自己的話，而且把《通鑑》文字中找不到資料出處的地方，視之為司馬光自己意見的表述。《通鑑》中我們找不到資料出處的文字，說它必然有所依據，只能用田餘慶的方法，間接證明；說它並無依據，是司馬光自己加上，也是難以證明，這裡不作討論。我想談的是，《通鑑》中有一些簡化的處理，能否當作有意的改寫？雍闓之死就是一個例子。《通鑑》卷七〇，魏文帝黃初六年（225）記：「漢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巂入，斬雍闓及高定。」就是田浩教授在文中所說的「司馬光稱讚諸葛亮把兩位叛將送上了斷頭台。」田浩教授指出，《通鑑》的記載與《三國志》卷四三，〈呂凱傳〉中所述：「及丞相亮南征討闓，既發在道，而闓已為高定部曲所殺」不同；也與《華陽國志·南中志》所記：「建興三年春，亮南征，由水

路自安上入越嶲。別遣馬忠伐牂牁，李恢向益州。以犍爲太守廣漢王士爲益州太守。高定元自旄牛、定笮、卑水多爲壘守。亮俟定元軍眾集合，并討之，軍卑水。定元部曲殺雍闓及士等。」有著明顯差異，而《三國志》與《華陽國志》的記載卻屬相同。《通鑑》記載與兩書不同，應該如何理解呢？我認爲只是爲了行文簡潔而已，理由是雍闓、高定都不是這段史事的主角，《通鑑》記述諸葛大軍所過，兩人被殺身死，只是爲主角孟獲的登場提供一點背景說明，實在不需要在兩人身上多費筆墨，簡單交待即可，而最簡潔的方法就是略去細節，只述結果。田浩教授說：「這裡，他跳出史料之外，或更改了史料，因而創造出一段細節，可能被讀作司馬（光）將平息叛亂的功勞歸於諸葛亮。」我不能贊同，主要的理由是《通鑑》撰述時大概不會注意到像「雍闓之死」這樣的一個「細節」，因爲史事繁多而篇幅有限，敘事話語必須有所壓縮，往往只能存其大意，細節部分也就無法照顧了。這種情形在《通鑑》中十分普遍，很難說是司馬光爲了某一目的而作的刻意改動。《華陽國志》的校註者任乃強對雍闓被殺作了一些細節描述，如曰：「……蓋亮知雍闓與定元攜隙後，使人招誘闓，命（王）士以益州太守入闓營撫之，爲定元所知，故襲殺闓與士也。」我以爲《通鑑》撰述者未必能夠了解得如此深細，我更相信，他們即使有了這般深細的認識，也不會將之記於《通鑑》，因爲著述有其體例，本末重輕之間，必須掌握分寸，不是重點所在，都不妨用簡化的方式，加以處理。

最後，我想以《通鑑》的記載爲範圍，談談我們如何理解敘事者意圖的問題。《通鑑》的撰述者從正史等典籍中選取資料，加以表述的時候，心中是否含有某種明確的意圖？我們能否很清楚地感受得到？這兩個問題雖然是研究《通鑑》時必須深入探討，卻不宜在這裡討論，我只想舉田浩教授大文中的一個例子談點自己的想法。魏明帝太和二年（228），諸葛亮引兵出散關，進圍陳倉，魏帝派張郃前往救援之事，《通鑑》卷七一的記載爲：

（帝）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盡糧，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

《三國志·張郃傳》的記載爲：

（帝）因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到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

兩書對讀，當可發現關於諸葛亮退軍的原因並不一致，而是有所出入，田浩教授的解釋是：

司馬光重構的敘事轉變了諸葛亮失敗的原因，不是因為面對強大的魏國增援蜀軍兵力之不足，而是由於從遙遠的蜀國供應軍隊所需糧草的困難。以此為背景，下面的這句話似乎支持這個觀點：「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換句話說，在司馬光的重構中，糧草的缺乏使諸葛亮退兵因此意味著，如果不是糧草問題，諸葛亮一定會勝利的。畢竟，即使在撤退之中，諸葛亮也能擊敗魏軍，斬獲魏將。

我不同意田浩教授的解釋，我不認為《通鑑》撰述者處理這段資料的時候，心中含有像田浩教授所指出的意圖。首先，《通鑑》的這段敘述可以說是撰寫者最基本、最典型的處理方式。他從《三國志·張郃傳》中選錄一段，其中魏帝的問話一字不易。之後接上取自《三國志·諸葛亮傳》中的記載：「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加以簡化，寫成。我們還可以注意到，在〈張郃傳〉中張郃「屈指計亮糧不到十日」的記載，《通鑑》敘述者看成是一個動作，並與張郃說的話結合起來，做了簡潔的處理，我們讀來覺得十分生動。上文引自新校標點本，標點者把這九個字納入張郃的話語中，顯然有欠高明。

其次，《三國志·張郃傳》中記郃晨夜進軍，諸葛亮退兵。表面文字讀來，諸葛亮退兵似可解釋為張郃援軍快速抵達所形成的強大壓力，但從紀傳體的體例上看，則不宜做如此解讀。因為紀傳體對傳主事迹的記述，依慣例都是一些特殊表現與重要成就。張郃料定諸葛亮孤軍懸入，糧草不繼，這是他的傑出表現，至於諸葛亮退兵的主要原因為何，已與張郃無關，不須在張郃傳交待。諸葛亮退兵的原因，陳壽在〈諸葛亮傳〉中作了明確的記述，「糧盡而還」就是陳壽的判定，就這一點而言，《通鑑》的撰述乃根據《三國志》而來。另外一個例子是馬謖之死。《三國志·馬謖傳》云：「謖下獄物故，亮為之流涕。」但在同書〈諸葛亮傳〉則記為：「戮謖以謝眾。」《通鑑》記曰：「收謖下獄，殺之。」即取二種記載，但以〈諸葛亮傳〉為主。田浩教授關於「馬謖之死」的解釋有欠妥適，或許也是對紀傳體的體例不夠熟悉之故。由於紀傳體中對傳主的記述每多維護，閱讀之時就要與其他篇章互相參照，方能得到較為全面的認識，而《通鑑》則是整合之後的敘述，只是限於篇幅，須加簡化而已。

第三，如果沒有糧草不繼的問題，從整個情勢上看，諸葛亮還是無法得到勝利。諸葛亮進攻陳倉的戰爭情況，《通鑑》作了相當詳細的敘述：「亮自以有眾數萬，而（郝）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墻。亮又爲地突，欲踊出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這是諸葛亮糧盡退兵前的情況，看來陳壽的評論：「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也不是全無道理。不過，這段記載取自《三國志·裴注》的《魏略》，立場多少偏於魏方，《通鑑》爲什麼要加以選錄呢？我想郝昭忠於職守，志節感人可能是主要因素，但也將諸葛亮在陳倉城下久攻不克的窘狀展露無遺。胡三省讀畢整件事情，寫下一段話：「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尙論其才，則全城卻敵者，其才非優於攻者也，客主之勢異耳。故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仍然肯定諸葛亮的才能，爲他緩頰的意味很濃，但在整體情勢發展上看來，胡三省也不會認爲諸葛亮有戰勝的可能。再說，張郃是魏國名將，《三國志·張郃傳》云：「郃識變數，善處營陳，料戰勢敵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也許有些誇大，然而我認爲《通鑑》撰述者必定熟悉這一記載，在他們的心中，相信如果糧草無虞匱乏，諸葛亮一定可以戰勝張郃，應該是很不可能的事。其實，關於「如果」的討論，意義不大，我只是想藉以說明探討歷史敘事者的意圖，似乎應該儘量體會敘事者心中的歷史全局與表述重點，而不只是在一件件的小事上加以「重構」。

田浩教授研究《資治通鑑》，採取與其他資料對讀的辦法，不辭辛苦地將不同典籍中的文句詳加比較，說明它的緣由，闡釋它的意義，進而提出新的觀點與看法。這是一種進入典籍之中，發掘問題，詳加探討的研究態度，就這一點而言，田浩教授的這篇論文已經具有重要的意義與可貴的價值。至於我對田浩教授的一些論斷不能贊同，提出來與他商榷，已經是次要的事了。